

Philosophy

中国哲学的传统更新

RENEWAL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李维武◎著

人民出版社

B26
2013/

Philosophy

中国哲学的传统更新

RENEWAL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李维武◎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的传统更新/李维武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ISBN 978-7-01-010673-1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哲学史-中国-现代 IV. ①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7298 号

中国哲学的传统更新

ZHONGGUO ZHEXUE DE CHUANTONG GENGXIN

李维武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8.75

字数:56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0673-1 定价:7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自序

我研究中国哲学的兴奋点出现变化,由古代哲学而转向 20 世纪中国哲学,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20 年前,1990 年 8 月,我在萧蓬父老师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20 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通过答辩,获得学位。一年后,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修订成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为我开展 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以此为生长点,我在以后 20 年间一直以 20 世纪中国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不仅对其中的问题、思潮、人物、文献进行了多方面多视角的探讨,而且将研究视域拓展为 19—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新方法。随着研究工作的拓展与深化,我越来越感到开展 19—20 世纪中国哲学,尤其需要解决好研究框架问题,在不断的思考与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 19—20 世纪中国哲学史观。

在我看来,自商周之际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哲学,尽管受到过印度佛教哲学的影响,从中吸取过外来哲学的资源,但基本上是自成一系发展起来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鸦片战争以来的 19—20 世纪中国哲学,则改变了这数千年来自成一系的哲学发展格局,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哲学文化风貌。鸦片战争开启的中国社会历史大变迁,以及由之而来的中西古今文化及哲学的碰撞、交流、融会,造成了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两大哲学运动,推动了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换,使得中国哲学在古代传统之后又形成了现代传统。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使 19—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开展,成为了中国哲学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古今之变”时期。只有这样看待 19—20 世纪中国哲学,才能拨开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诸多蔽障,解开人们对于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的重重困惑,对 19—20 世纪中国哲学予以同情的了解、本质的把握和历史主义的合理阐释。也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真正做到“通古今之变”,特别是把握好一个“变”字。这就是我的 19—20 世纪中国哲学史观的基本点。

关于 19—20 世纪中国哲学史观的思考,我曾在《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一书中作过专门阐发,该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 年出版,而更多地则是通过撰写论文,从不同的论题、视角、层面来进行说明。虽然有些论文由于写作时间距离较长,其中的某些观点在前后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这些论文的基本观点是一以贯之

的,都表达了我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的理解。近些年来,我总希望把自己的有关论文结集,使之能够对自己的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观及其相关研究有一个集中系统的表达。2007年,我从已经发表的论文中选出33篇,结集成《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一书,由中华书局于2008年出版。现在,我又以近三年新发表的论文为主体,加以部分往年发表的论文,选出35篇,结集成这本《中国哲学的传统更新》,交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本论文集,所收录的论文没有重复的,在内容上都鲜明地表达了我的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观及其相关研究,因此可以相互发明,彼此补充,称得上姊妹篇。当然,两书也各有其侧重点,这就如书名所表达的,前书侧重于阐发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本书侧重于探讨中国哲学的传统更新问题。

在本书中,我根据论文所讨论的问题,把收录的论文分做了六组。

第一组论文题为“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从总体上探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着重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观的思考与探索。第一篇论文《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关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观的思考》,是对于这一思考与探索的系统阐发,实为全书的总论。其余的论文,或从不同视角入手对这一问题作更具体的探讨,涉及1919年五四运动对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促进问题、现代大学哲学系对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的影响问题、土家族哲学的历史演变与现代转型问题;或从方法论入手强调“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涉及重建中国哲学研究的历史感问题、在历史与现实的联结中确定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兴奋点问题。最后一篇是访谈录《拓展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思维空间》,回顾了我开展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历程,有助于了解我的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观的形成过程。

第二组论文题为“哲学转型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以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为中心,考察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中,从哲学问题的层次上看,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是最抽象的哲学问题,也是哲学史上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反复探讨的问题。而正是这些既抽象又古老的哲学问题,构成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的核心问题,最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因此,探讨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对于研究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具有重要意义。本组的前两篇论文,着重讨论了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第一篇论文《中国哲学: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从总体上回顾了19、20世纪之交以来的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环绕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的开展。第二篇论文《科学与玄学论战:本体论问题的提出》,则对1923—1924年科学与玄学论战进行了重新解读,指出这一论战实是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环绕本体论问题所开展的第一次论争,深刻影响了以后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开展。另外两篇论文,着重讨论了20世纪中国哲学认识论问题,论及知识客观性问题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知识论路向开展问题。

第三组论文题为“哲学转型中的政治哲学问题”，以政治哲学问题为中心，考察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中，从哲学问题的层次上看，政治哲学问题是最具体的哲学问题，所要回答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并不是哲学史上古已有之的问题，也不是西方哲学发展中会出现的问题，但却是一个直接关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因此对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在19—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中，从西方传入的民主观念无疑是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哲学家们环绕民主观念所展开的不同阐发，不仅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回答，而且深刻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及其所包含的现代性的选择，这两个方面都值得重视与探讨。本组的两篇论文《五四运动与民主观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变化》与《儒学与民主：文化保守主义民主观念的近百年变化》，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对民主观念在20世纪中国的变化进行了考察。从中可以看出，1919年五四运动，深刻改变了中国人对于民主观念的理解，并由此而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发生了深刻影响；即使是文化保守主义，在对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其现代性进行尖锐批评和深刻反省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作为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其现代性核心内容的民主观念的接纳与吸取。民主观念在20世纪中国的变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

第四组论文题为“现代新儒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从现代新儒学入手，考察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现代新儒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中的一大思潮，对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有着深入独到的探讨，对政治哲学问题亦有过专门的思考。在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上，现代新儒学复兴了形上儒学，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主体，为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上，现代新儒学创造了文化儒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对发掘与阐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现代价值，亦有着重要贡献。本组中的论文，着重对现代新儒学作为形上儒学、文化儒学的开展、成就及限制进行阐发，其中亦关涉政治儒学的开展。其中前两篇论文是总论性的。第一篇论文《近50年来现代新儒学开展的“一本”与“万殊”》，对现代新儒学自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表以来半个世纪的分合流变进行了系统考察。第二篇论文《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实质、原因与影响》，则对文化保守主义在20、21世纪之交的再度兴起进行了专门探讨。后面的几篇文章，则分别对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的哲学思想进行阐发，不仅论及他们关于文化儒学与形上儒学的思考，而且对他们与道家哲学思想的联系进行了专题探讨，还指出了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对徐复观的深刻影响，探讨了徐复观新儒学思想的独特西学来源。其中，与何萍教授合写的《熊十力〈明心篇〉述评》一文，成稿于1985年，修订于1988年，是我开始转向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起步之作。正是通过对熊十力《明心篇》的细读，从中感触到20世纪中国哲学的智慧、创造力与意义，并从中发现了理解20世纪中国哲学

的门径,这就是以文化哲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 20 世纪中国哲学。因此,这篇文章在我的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有特殊意义和重要位置。最后一篇是笔谈录《交融与会通:关于现代新儒学开展的若干问题》,写于 1999 年,发表于 2000 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那时对现代新儒学开展的看法,其中的个别观点已不适合于最近 10 年来中国思想世界的变化,但其基本观念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合理的。

第五组论文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入手,考察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中的一大思潮,而且以其实践性格与批判精神,对 20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在 20、21 世纪之交,随着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来源于西方的思潮,在中国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困境。在我看来,这个困境不是靠时下许多人所主张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就可以得到说明与解决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 20 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中,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 20 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动中,积极参与了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创造,成为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有机内容,才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说明和解决。这组论文中的前四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如何继承》、《从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对这一看法的集中阐发。可以说,这些文章从一方面具体地表达了我的 19—20 世纪中国哲学史观。后面几篇文章,则从具体时段或具体人物入手,具体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现方式问题,既论及 20 世纪 30—40 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形态问题,又探讨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对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见解与追求。最后一篇《邓小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智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点上,对邓小平的辩证思维方式的内涵与特点进行了新的理解与阐发。

第六组论文题为“武汉大学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以武汉大学的哲学人物与哲学传统作为个案,考察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重视湖北地区及武汉大学的哲学人物与哲学传统,是我开展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有特色的内容。我感到,通过探讨这些能够直接感触到的具体个案,使自己的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既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能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这组论文的前三篇文章,分别论述了纳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丛书的三部 20 世纪中国哲学名著——王拱著《科学概论》、范寿康著《中国哲学史通论》和李达著《现代社会学》,对三书的哲学思想内涵及其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中的意义与价值,进行了深入阐发。这组论文的后两篇文章《萧蓬父老师与 1978 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早期启蒙说的历史演变与萧蓬父老师的思想贡献》,则是对我自己老师的哲学思想的探讨。萧蓬父老师于 2008 年 9 月 17 日逝世。对老师的深深怀念,促使我对他的哲

学思想作深入探讨,希望能借此使人们对他的哲学贡献有一个具体而真切的了解,并由之而对武汉大学的哲学传统有一个具体而真切的了解。

1991年,当我的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经修订行将付梓时,萧老师欣然为之作序。序言的最后一段写道:“李维武同志曾耕读天门,学工汉上,八十年代初考取硕士研究生以来,深自桉括,不务浮明,博涉浚求,积学精思,矻矻十年,成此专著。晴空鹤唳,不负所期,乐观其成,喜为之序。至于面向未来,任重道远,心炬之传,愿共勉焉。”这些年来,我一直牢记老师的教诲、叮嘱与希望,努力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奋力前行,不敢懈怠。《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更新》这两本论文集,可以说从一个方面记录了自己在老师鼓励下探索与思考的足迹。

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书的各篇论文,都对文字及引文做了重新校订,恢复了原来发表时因篇幅限制等原因被删节的内容,对个别前后有变化的观点用注释形式作了说明,为了使这些新加注释与原有注释相区别,前面加了“本书作者说明”字样。

李维武

2010年8月24日于武汉大学

目 录

自 序	1
-----	---

一、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

——关于 19—20 世纪中国哲学史观的思考	3
五四运动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22
现代大学哲学系的出现与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的开展	30
土家族哲学的历史演变与现代转型	
——萧洪恩著《土家族哲学通史》序	48
重建历史感与中国哲学史研究创新	55
2009 年:中国与中国的哲学世界	60
拓展 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思维空间	
——李维武教授访谈	63

二、哲学转型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

中国哲学: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	77
科学与玄学论战:本体论问题的提出	93
20 世纪中国哲学认识论中的知识客观性问题	
——袁彩云著《经验·理性·语言——金岳霖知识论研究》序	118
张东荪与金岳霖:中国现代知识论的两种路向	125

三、哲学转型中的政治哲学问题

五四运动与民主观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变化	133
儒学与民主:文化保守主义民主观念的近百年变化	152

四、现代新儒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

近 50 年来现代新儒学开展的“一本”与“万殊”	181
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实质、原因与影响	195
熊十力《明心篇》述评	204
重建本体论:熊十力与道家哲学	218
心通九境:唐君毅与道家哲学	230
徐复观对熊十力思想的阐释	242
徐复观对道家思想的现代疏释	258
卡西尔对徐复观思想的深刻影响	
——张晚林著《徐复观艺术诠释体系研究》序	268
交融与会通:关于现代新儒学开展的若干问题	
——李维武先生笔谈录	274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点	29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	296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如何继承?	307
从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316
20 世纪 30—40 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形态问题	322
张申府先生的哲学精神	339
张岱年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及其启示	347
邓小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智慧	360

六、武汉大学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

王星拱著《科学概论》再版前言	379
范寿康著《中国哲学史通论》再版前言	391
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唯物史观的阐释	405
萧蓬父老师与 1978 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418
早期启蒙说的历史演变与萧蓬父老师的思想贡献	426
后 记	452

一、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

——关于 19—20 世纪中国哲学史观的思考

对于鸦片战争以来的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者们往往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之不同,并不在于是否承认 19—20 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数千年中国哲学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不同;也不在于是否承认这一变化与不同的根源,来自中国从鸦片战争起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以及由此而来的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大规模传入中国;而在于如何看待、理解和评价中国哲学的这一历史性变化。这种看法之不同可大致归结为两派观点:一派认为,中国哲学在 19—20 世纪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中国哲学的自性、特质与传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近一个半世纪来,中国哲学的主流开展实际上背离了中国哲学的自性、特质与传统,大概只有现代新儒学才能算是中国哲学的自性、特质与传统的真正继承者;21 世纪中国哲学只有回归 19 世纪以前的中国哲学传统,甚至只有回归“轴心时代”的先秦哲学传统,才能接上中国哲学的正统。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哲学在 19—20 世纪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促成了中国哲学的形态转变与传统更新;近一个半世纪来,中国哲学经历了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转型,继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之后形成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21 世纪中国哲学应当以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为起点,承继和发扬中国哲学现代传统而作新的开展。这两派不同的看法,鲜明地反映了在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两种哲学史观的分歧,直接关系到对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的理解与书写,也直接关系到 21 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由此可见,在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哲学史观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笔者赞成后一种哲学史观,但又感到这一哲学史观尚需予以深入阐发,使之具有马克思所强调的理论的彻底性以及由之而来的影响力与吸引力,因此在这里试对自己的有关思考加以阐发,以期引起研究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探讨。

一、19—20 世纪中国哲学的主轴线

鸦片战争以来的 19—20 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数千年的中国哲学开展相比,首

先在哲学文化风貌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在中国哲学史上,还没有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像19—20世纪中国哲学,吸取了那么多西方的思想,改变了那么多传统的内容,在中西古今哲学的碰撞、交流、融会中,涌现了众多的哲学人物、林立的哲学派别和纵横起伏的哲学思潮,由此而造成了中国哲学的空前大变动。这种哲学文化风貌,不仅就其复杂性、多变性言,而且就其创新性、深刻性言,都是以往时代的中国哲学开展所难以比拟的,即使是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先秦哲学中也未曾出现过。这种创新性、深刻性在于,在这一个多世纪纷繁复杂的哲学格局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主轴线,即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变,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可以说,只有这种哲学形态的历史性转变,才是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最本质、最深刻的东西。

所谓哲学的形态,是指哲学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一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规定了一定时期哲学的致思趋向和话语系统,规定了一定时期的哲学文化风貌,使之与以往时代的哲学呈现出明显的区别。哲学的形态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基本不变,但又不是凝固的、永恒的、僵硬的,不仅有量的变化,更有质的更新。随着文化历史变迁的影响,随着由之而来的思想世界的变化,哲学的形态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变化,由旧的形态逐渐转换成新的形态。这种哲学的形态由旧而新的转变,就是哲学的转型。因此,所谓哲学的转型,是指哲学的一定的思维方式所发生的质的飞跃及其新质的展开,是指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的转变。正是由于有哲学的形态转变,所以造成了哲学发展的大的阶段性的区分。

从世界哲学发展的视域看,不同民族的哲学思维方式在历史上都存在着转变的问题,不可能固定在一中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上,因此不同民族的哲学都有自己的转型。但这种转型,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尤为鲜明和典型,呈现出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相当分明的发展阶段,其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表现出明显的质的差异性。自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伴随着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向前近代的非西方民族传播,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与这些非西方民族原有的哲学发生冲突与融合,促使这些非西方民族的哲学由古代形态转向近代形态再转向现代形态,从而促成了不同民族的哲学走向世界哲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哲学由于这种示范作用和推动作用,被赋予了一种世界性,使得前近代的非西方民族在进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后,必须引入、学习、吸纳西方哲学的思想内容。这样一来,西方哲学的转型,就往往成为研究者们衡论不同民族哲学转型的一个尺度、一个参照系。在考察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转型问题时,也少不了使用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而且,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就是通过中西古今哲学的彼此争鸣、相互激荡、重新熔铸而实现的,因此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与19—20世纪中国哲学就有着内在的历史的联系,并不是研

究者们主观地从外部强加到中国哲学自身的进程上的。可以说,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本身就内在地历史地蕴含着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

通过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来看中国哲学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鸦片战争以来19—20世纪中国哲学同样经历了现代转型,这一转型呈现出两个大的阶段:在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下半叶,中国哲学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而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哲学又开始了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早在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已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封建统治者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开始从政治哲学入手思考这种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自改革”^①的主张。鸦片战争后,魏源首先开眼看世界,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②的主张。龚、魏的新思想,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哲学的开展,使得中国人的历史观、文化观和政治哲学最终超越了古代哲学的框架与内涵,正如梁启超所说:“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③到了19世纪最后10年,康有为、谭嗣同、严复进一步在哲学本体论问题上取得了新突破。康、谭沿着中国古代哲学杂糅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传统,把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观念结合起来,建构起具有近代哲学特征的本体论体系。严复则引入西方近代经验主义传统与现代实证主义原则作为新哲学的基础,解构中国古代哲学杂糅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传统,建立起以牛顿力学与达尔文进化论为框架的科学宇宙论,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完全近代意义的哲学体系,同时又成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开端。这样一来,中国哲学仅仅用了短短大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并进而开始了向现代形态的转变。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哲学中的不同思潮相继传入中国,中国哲学家对于西方哲学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如果说严复对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科学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进化史观都有开启之功,那么王国维则开始把西方人文主义哲学引入中国,并敏锐地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中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分歧与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这时传入中国,受到当时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的关注和介绍:朱执信于1906年在《民报》上发表长文《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第一次把马克思作为革命家兼哲学家介绍给中国人;孙中山于1912年在上海发表公开演讲,首先在中国内地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名著《资本论》。1915—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更是意义重大。新文化运动中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分别凸显和深化了中国人对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政治哲学问题、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使得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由此

①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叙》,见《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7页。

③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第1卷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7页。

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哲学家开始融会中西古今哲学资源,建构了代表不同哲学思潮、具有不同哲学风格的本体论、认识论体系,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道论”与“知识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张岱年的“天人五论”等。这些各具个性与特色的哲学体系化创作,成为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标志性成果,对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开展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以后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开展,都与这些标志性成果分不开,或是沿着这些成果的思路进一步拓展,或是针对这些成果的问题进一步探索,或是根据这些成果的思想资源进一步综合创新,从而从不同方面推进、深化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由此可见,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发展相类似,也经历了从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转变;正是这种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构成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主轴线。只是与西方哲学的转型相比,中国哲学的转型属于后发生型,因此难以像西方哲学那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自然而充分地完成转型,而只能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里十分急促而紧张地实现形态的转变,其局限与不足就自然难以避免。尽管如此,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发生及其意义则是不可否认的。

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之所以会形成两种不同的哲学史观,产生出两派不同的看法,是否认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正是其关键。看不到这一主轴线或否认这一主轴线,当然只会把中国哲学在19—20世纪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理解为对中国哲学的自性、特质与传统的冲击和破坏,否定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创新性、深刻性。相反,只有抓住了这一主轴线,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哲学在19—20世纪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揭示其间所蕴含的创新性、深刻性,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作出正确的看待、本质的理解和合理的书写。换言之,只有抓住了这一主轴线,才能建立起合理的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观。

二、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总特点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尽管是在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强烈影响下发生的,参照了西方哲学的转型尺度,吸取了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但并不就意味着是对西方哲学发展进程的简单模仿、照抄照搬,也不意味着是用西方人的哲学思维与哲学话语来代替中国人的哲学思维与哲学话语,更不意味着是把中国哲学的发展由此纳入西方哲学的轨道,而是有着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基础、背景与传统,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具体地说,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是在近代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基础上发生的,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进行的,是通过由古代形态中国哲学而近代形态中国哲学而现代形态中国哲学实现的。因此,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又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主

要通过两种哲学运动鲜明地呈现出来:一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二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这两种哲学运动,在实际的哲学发展中是合为一体的,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总特点。

自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哲学中的各种理论、体系、思潮先后传入中国思想世界,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起了示范作用和推动作用。但这些传入中国思想世界的西方哲学思想,在影响、促进、参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既显示了自己的世界性的一面,又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作一种新的理解和阐释,即需要经过一番新的思想创作,或者在古代形态中国哲学的传统中找到契合处,或者参与到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来。只有经过这种新的理解和阐释,经过这番新的思想创作,从而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或发展建立起一定的联系,一种外来的哲学才有可能真正为中国人所接纳,进而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使自己逐渐转化成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可以说,这是任何一种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产生影响的西方哲学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

20 世纪 30 年代,孙道升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中,曾把现代中国哲学开展按对待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态度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纯宗西洋哲学”,二是“兼综中西哲学”。前一系统是照抄照搬西方哲学,西洋现代有某派哲学,中国现代也有某派哲学,如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唯物论、新唯心论。后一系统则有一种创造的意味在里面,是糅合中西两种哲学而组织成功的,如唯生论、新法相宗、新陆王派、新程朱派。在这里,孙道升认为在 20 世纪中国哲学中有一部分派别是纯粹由外国引进的,是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外国人的东西的。但他所列举的“纯宗西洋哲学”诸派别,实际上都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并不存在那种“纯宗”的性质。如实用主义哲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由胡适引入中国思想世界后,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作了与其原来的意义不尽相同的变形。本来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并不是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也不仅仅是对科学方法的看重和强调,但胡适却极力凸显了实用主义看重和强调科学方法的方面,进而把实用主义解释成为就是一种科学方法,纳入到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主义思潮中来,从而使实用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的狂飙突进相伴随相结合而影响一时。又如被称为新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更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再到冯契的“智慧说”,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吸取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解读、重新创造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思想世界的深刻影响,正是通过不断的中国化而实现的。由此可见,中国哲学家在接引西方哲学过程中,不只是起传声筒的作用,也不仅仅充当翻译家的角色,而显示了自己的创造性。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所追求的目标,是要把西方哲学中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引入中国思想世界,并不是要对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的自